



皖南事变前后

贵州的反迫害斗争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皖南事变前后
贵州的
反迫害斗争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皖南事变前后
贵州的反迫害斗争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贵州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印数 2500 本

内部书刊印制许可证
黔新出(91)图字第031号

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
的子孙万代：像我们所前
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
永远与一个革命党，永远当一
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
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
产主义者。

邓小平

这是邓小平同志1963年3月为《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一书的题词

皖南事变前后 贵州的反迫害斗争

目 次

综 述

皖南事变前后贵州的反迫害斗争综述

.....编委会 (1)

专题论述

浓雾弥漫罩古城

——皖南事变前后贵阳地区的革命斗争

.....贵阳市党史研究室征研一科 (24)

皖南事变前后遵义地区斗争形势浅析.....游平伟 (31)

皖南事变前后黔西北地区斗争形势剖析.....邱 亮 (39)

镇远地下党支部被破坏始末.....镇远县党史研究室 (47)

皖南事变前后铜仁国立三中的学生运动.....高振亚 (52)

皖南事变前后黔西区顺利完成荫蔽疏散

党员工作的剖析.....黔西南州史志办 (55)

皖南事变前后凯里县小组的斗争

.....凯里市党史研究室 (62)

皖南事变前后的织金地下党组织.....杨玉书 (68)

试论安紫边区地下党存在和发展的原因.....饶名炳 (74)

望漠抗日救国义勇军被镇压始末.....王柏林 (82)

扑不灭的革命烽火

——皖南事变前后赤水地下党组织的反迫害斗争

.....饶天锦 (87)

贵州革命自助会.....李新生 (90)

公路运输支部斗争纪实.....于鑫 (98)

刘伯龙在黔东的特务统治.....石有恒 (105)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王作春 (109)

皖南事变前后的贵州特务组织及其阴谋

活动.....沈 涛 (111)

烈士简介

姚荣显 (1918—1940) (121)

牙永平 (1909—1940) (122)

肖次瞻 (1905—1940) (123)

关祖潜 (1922—1941) (124)

蔡应达 (1917—1941) (125)

黄大陆 (1904—1941)	(126)
李 策 (1915—1941)	(127)
严金铨 (1921—1941)	(128)
张益珊 (1912—1941)	(129)
凌毓俊 (1916—1941)	(130)
王 栻 (1918—1941)	(131)
欧阳崇庭 (1911—1941)	(132)
陈济民 (1915—1941)	(133)
蓝运斌 (1912—1941)	(134)
寇述彰 (1913—1941)	(135)
蓝运钟 (1914—1941)	(136)
王定一 (1905—1941)	(137)
瓦光鹤 (1917—1941)	(138)
李亚群 (1911—1941)	(139)
傅方权 (1920—1941)	(140)
阮俊钜 (1900—1941)	(141)
赵文海 (1898—1941)	(143)
林正良 (1909—1941)	(144)
李绍夫 (1904—1941)	(145)
邱纯和 (1917—1941)	(146)
熊大瀛 (1917—1941)	(147)
陈光型 (1913—1941)	(148)
郭 嘉 (———1942)	(149)
李德富 (———1942)	(149)
王发善 (1919—1942)	(150)
陈法轼 (1917—1942)	(151)

傅以平 (1911—1942)	(152)
周承浩 (1918—1943)	(153)
王国柱 (1919—1943)	(154)

英 烈 赞

肖次瞻同志在狱中	李宗泽 (155)
忆挚友黄大陆	范鼎三 (161)
在记忆深处	丁毅 (171)
深切怀念姚荣显烈士	吴让堃 罗斗庭 (181)
革命伴侣	
——记寇述彭、蓝运臧烈士	蓝芸夫 (185)
缅怀战友王定一	熊唯真 (196)
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后人泪满襟	
——回忆丈夫牙永平	韦光珍 (204)
亦师亦友	
——回忆傅以平烈士	杜良俭 (210)
忆我们的父亲林正良烈士	林天柱等 (215)
炼狱	
——记凌毓俊烈士	凌毓星、朱世芬 (225)
平凡而光辉的一生	
——怀念我的五哥严金铨	严金莹 (232)
“四·一二”忆周存浩	圣血 (239)
铁骨铮铮 一代楷模	
——回忆王发善烈士	李正裕 (246)

江岛逆流存千古

——陈法弼烈士及其不朽的诗篇……………何世红(250)

缅怀与寄望

——对陈光型烈士的五十年祭……………石 果(259)

风 云 录

适应斗争形势的疏散转移……………罗 明(267)

我们的党小组……………聂 群(272)

历尽艰辛为找党

——记我从贵阳转移后的一段经历……………舒琛珍(279)

在疏散转移的艰苦岁月里……………杜龙源(284)

一份特别情报……………许端红(287)

宋大鸣上瑶山……………高福祥(289)

逃离集中营前后……………孙家林(293)

越狱脱险记……………丁 文(303)

大 事 记

皖南事变前后贵州的反迫害斗争大事记

(1940—1943)……………编委会(308)

编 后

……………编委会(315)

皖南事变前后贵州 的反迫害斗争综述

编委会

(一)

皖南事变前贵州的政治形势 和党对形势发展的正确判断与决策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比较落后和封闭的贵州，由于中共贵州省工委积极领导群众，利用多种形式，进行了秘密与合法的斗争，先后组织了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并通过筑光音乐会、骆驼业余话剧社、合群体育会艺术部、贵阳文艺界抗日救国会、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宪政促进会以及新文字研究会、世界语学习小组、平民通讯社和各地区、各大中小学校的歌咏队、话剧队，还有职工中的抗日救亡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省工委对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领导，使党的影响不断扩大，党的组织不断建立和健全。省工委先后对遵义、贵阳、思南、安

顺、毕节、湄潭、黔西、大定、仁怀、织金、镇远、炉山、平越、桐梓、晴隆、紫云等地的党组织进行整顿充实。与此同时，也在一些群众团体、大中学校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①

这个时期的贵州国民党当局，既不能不顾历史潮流，又切实执行了蒋介石1937年9月颁布的《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规定，在武汉、广州失守前的1938年，就一次又一次地制造了全国罕见的镇压爱国运动事件。这就是贵州有别于其它省区之处。

在震惊全省的“二一九”“学联”事件中，贵州国民党当局逮捕了中共贵州省工委负责人黄大陆、李策、工委机关机要人员严金蛙以及学生领袖于蕴、聂奇慧、李德邦、饶元祚、王栻、方为策、周树楹等。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写社论，发消息，诬陷黄大陆等是“托派”、“汉奸”，还假借民意，杀气腾腾地要求枪毙这些共产党员和爱国学生。在我党积极组织营救、贵阳知名人士联名具保请释和社会责难的强大压力下，不得已于3月4日将于蕴等6人释放，仍以种种无理藉口继续监禁黄大陆、李策、严金蛙、王栻等4人。

仅隔数月，贵州国民党当局又制造了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八一三”“民先”事件。以限期进行登记为名，派出警宪、特务武装包围“民先”队员的集合场地，逮捕了30多位“民先”队员。被捕的“民先”队员们，在牢狱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省工委也动员被捕队员的家长出面保释营救。国民党贵州当局慑于社会舆论，将大部分人员释放，队长张益珊、副队长凌毓俊亦被长期关押。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这是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的重大转变。国民党既不敢恢复“剿共”的口号，也不敢丢掉“抗日”的招牌，因此采取了“制裁共产党要运用民众形式，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须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地方务求紧严，中央可示宽大”等两面政策。^② 贵州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强了特务统治，加紧了反共活动。

1939年初，贵阳筑光音乐会的艺术指导常学墉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后援会贵州分会，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为此请示中央社会部，社会部在3月2日的复函中明确提出要在成立时夺取领导权，说“如常学墉等确有共党外围之嫌，应设法勿令参加，并策动本党同志取得该分会之领导权。”其实，贵州国民党当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未等复函到来，早就安排打手深夜把常学墉毒打致伤。^③ 几天后，另一个艺术指导、残腿的谢凡生同样也遭毒打。二人被迫转移重庆。

1939年4月，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强行解散。^④

1939年7月，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竟以“账目不清”的罪名勒令沙驼业余话剧社停止活动半年。^⑤

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贵州当局加紧进行反共活动，无论是在省城贵阳，还是在各专县，乃至边远的赤水、镇远，到处都有特务伺机进行破坏和镇压。

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标志之一，就是在国统区增设特务机构，扩充特务编制。

1940年1月，“中统”特务管颂北接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室主任职务后，即将股改为科，增设书记及行动队。翌年，建立“特工高级干部会议”，增设贵阳及黔北督导区。其控制的机构有：省社会处、田粮处督察室、盐务缉私督察员、秘密学生党员小组、唯生学会等。

“军统”在贵州的特务机构，以贵州省保安处谍报科（即保四科）和省会警察局为主要据点进行活动，特务头目多兼任军警要职。其控制的公开机构有邮检所、邮航检查站、侦缉队、缉私处、公路总局调查室等。^④

1941年初，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即密令各省市成立党政军特种联席会报，使省市党政军各界在“特种案件”的处理上统一情报，统一步调。“黔特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组成人员有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兼“黔特会”代主席黄宇人、保安处处长韩文煥、社会处处长周达时、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参谋长王天鸣、中统黔室主任管颂北、军统黔站站长李毓楨、黔省党部委员黄国祯、刘孔亮等。下设情行、宣传、审讯三个组，负责情报搜集、逮捕、审讯及特种宣传。各专县都相应成立了“特会”这一“反共”、“防共”组织^⑦。

贵州更有其特殊之处者，蒋介石为了牢牢控制贵州，还把特务头子康泽统率的别动总队改编为新编28师和29师，安排别动总队总队长刘伯龙为新编28师中将师长，以禁烟、剿匪为名，进驻贵州。到贵州后，又被任命为黔东北绥靖指挥官兼管贵阳绥靖，其绥靖指挥部设在黄平县新州，所属三个团分驻遵义、贵阳、铜仁、施秉等地。刘伯龙是一个嗜杀成性的屠夫，从1939年春开驻黄平至1942年移防云南，滥杀无辜数以千计。这些地区的国民党党政当局，也就利用“驻军”的淫威大肆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捕杀革命人士。^⑧

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汪精卫组成汉奸政府，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南方局给各个地区的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指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愈演愈烈，时局严重。为巩固组织，免遭打击，以利抗战建国之顺行进

行，必须立即改变我们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立即转到基本上是地下党的形式，并以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迅速撤退已暴露的党员和干部，把组织工作的重心放到巩固党的组织上面，加强党员的训练和秘密工作教育。^⑨

1940年3月，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到重庆，南方局代理书记博古指示：贵州党组织应作紧急疏散，另建荫蔽的新的领导机构；已暴露的干部要撤走。4月，省工委委员蔡天真等撤回延安，由邓止戈、陈于彤、张述成、肖次贍、杜守教组成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工委的任务主要是贯彻党的“荫蔽精干”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将已暴露的党员骨干进行转移，调整各级领导班子。^⑩

为了迅速贯彻“荫蔽精干”政策，在省临工委召开的龙里会议上，将贵州全省党组织进行调整，划为贵阳、黔北、黔西、黔东四个区，分别由胡庆声、陈济民、田伯萍、张立、肖维亮、龙有光等负责。决定邓止戈领导黔东区，陈于彤领导黔北区和黔西区，张述成协同肖次贍以贵阳为重点，深入基层，摸索情况和经验。还决定在贵阳建立平行组织，同原来贵阳的党组织各自独立工作，不相联系。针对党内存在的麻痹思想，要求加强阶级教育，气节教育和斗争方式方法教育。^⑪

同年5月4日，党中央在《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这一指示里，进一步系统而完整地指出：我党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并着重指出，要“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

事变。”②

(二)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贵州当局的反共罪行

国民党贵州当局在皖南事变前后的反共罪行，按时序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0年4月至12月，以限制救亡运动、解散救亡团体为先导，在全省范围内肆意逮捕革命群众。第二阶段：1941年1月至10月，以省城保安司令部防空洞为主要刑场，在全省范围内杀害了大批革命者。第三阶段：1941年11月至1943年初，继续搜捕和杀害革命人士。

现分述如下：

第一阶段：1940年4月至12月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虽已被打退，贵州全省的政治形势却依然险恶。正当省临工委召开龙里会议，认真研究党的“荫蔽精干”的十六字方针，作出若干具体部署，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时，敌人的破坏活动从限制救亡运动开始，逐步发展到明目张胆地查封救亡团体，肆无忌惮地逮捕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

在省城贵阳，省临工委及时通知了各个支部，特别是抗日救亡团体的党支部，要提高警惕，讲究斗争的方式方法，争取既能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又能保存队伍。省城的筑光音乐会、骆驼业余话剧社和合群体育会艺术部，都是比较活跃的经过国民党省党部同意登记的抗日救亡组织。几年间抗拒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制造的多次捣乱。1940年6月初，合群体育会艺术部正积极筹备

第三次公演，国民党贵州当局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突然发出立即解散的通令。6月18日，贵州省党部又籍口筑光音乐会“非法”秘密集会，公开登报勒令解散。6月30日晚，勒令沙驼业余话剧社立即解散。整个山城被白色恐怖笼罩，贵州地下党直接领导的这三个救亡团体的党员和革命群众被迫进行紧急疏散。^⑬

由于军统骨干刘伯龙的队伍进驻黔东北，其矛头主要是针对当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抗日活动及少数民族的抗暴运动，因此，黔东北各地的地下组织不断受到迫害。

在镇远，1940年春即发生学生宿舍和周公馆（地下党活动点之一）突遭搜查的事件。11月，支部组织委员张文锐被捕。12月，支部书记欧阳德凤及严友德被捕^⑭。

在平越（今福泉县），交通大学支部书记徐达德与检查工作的省临工委书记邓止戈于中秋夜同时被捕。邓止戈趁赶场天从拘留处逃出后，转移到贵定县新民小学荫蔽。^⑮

在铜仁，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李超英接任校长职务后，即致函邮局：“……望贵局将本校学生所发信函逐日封包之前赐本校派员检验，以期防微杜渐……”。12月，配合县党部书记黄新运及驻军，逮捕学生庄士泽、蒋澄斋等8人。^⑯

在思南，1940年7月，县长杨仲皋亲自带领“边远农村工作团”及保警武装包围城区小学，逮捕熊大瀛、李宗泽、商学礼，并在李家坡抄去书籍文件一批。接着逮捕了安熹、金贵昌等7人。^⑰由思南调贵阳担任省临工委秘书长的原思南县委书记肖次瞻，也于7月19日在贵阳被捕。^⑱

肖次瞻被捕后，省城形势日益恶化。1940年8月至12月，毕节县工委组织委员葛发生和华侨司机郭嘉、李德富、筑光音乐会支

部宣传委员饶元祚、贵阳女师支部书记吴直、原贵阳县委书记谢凡生、地下党员丁文、陶生民、顾文淑等先后在贵阳被捕。

毕节地区和西南公路总局系统也发生了逮捕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事件。

1940年间，全省被捕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共92人，仅贵阳地区就有肖次瞻等25人，各专县押送贵阳的有熊大瀛等33人。为了关押被捕者，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贵阳设立了许多公开的和秘密的监狱。规模较大的是保安处看守所、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警察总局看守所、第一监狱（模范监狱），此外还有堰塘坎唐家花园“军统”黔站办事处、大井坎12号贵阳区行动队、和平路91号和仓后街“屋顶花园”等。肖次瞻被关押在省保安处看守所，12月7日深夜即被杀害于此处的地下防空洞。杀害肖次瞻，是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在全国性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到来之际，进行疯狂逮捕屠杀的预兆。

第二阶段：1941年1月至10月

1941年1月5日，新四军军长叶挺率部9千余人由安徽泾县云岭启程北移，遭国民党7个师8万多人的截击围攻，激战8昼夜，除千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7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命令和谈话，诬陷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①

1月18日，《贵州日报》刊登了皖南事变的消息，接着发表了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宇人在纪念周所作题为“讨逆”报告^②这个报告是为了更大规模的逮捕与镇压而动员舆论，至于手中的屠刀，早就对着狱中的革命志士，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